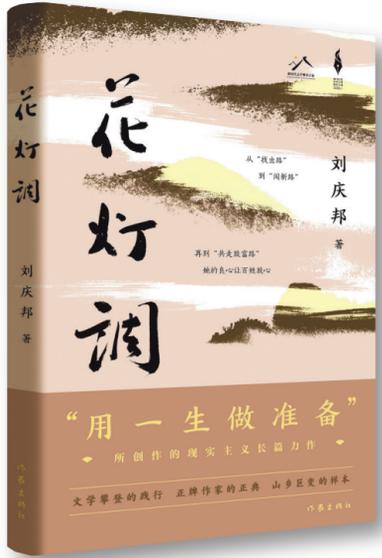


人与一部作品的相遇有时就是一个奇迹,比如刘庆邦与他的新作《花灯调》。刘庆邦也是著作等身的作家了,我还很少见到他对自己的一部作品如此的看重,如此的激动。从庆邦事后许多的自述与访谈可以看出来,《花灯调》是一部实现他理想的作品,不仅是创作理想,而且是人生理想。对庆邦这一代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不要再穷,不但自己不穷,还要家庭、家族不穷,家乡不穷,国家不穷。所谓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对他们而言,真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想,一种实实在在的渴望。所以,看到《花灯调》的日记,我们隔着纸都能感受到他的欢欣、他的激动,犹如拨云见日,阳光普照。我能想象庆邦的心情,他仿佛就在小说中的高远村,就在高远村庆祝脱贫摘帽的现场,他就是接受脱贫证书的高远村的一个村民。对刘庆邦而言,说《花灯调》是他的一部小说,显然说小了,对他来说,这部作品的写作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的文学创作,这是他人生高光时刻,也是他全部人生理想与经验的倾情投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除了文学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他欣慰地说道:“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人与自己写作的关系很少能达到这种程度吧。真的为刘庆邦高兴,什么叫得偿所愿?什么叫快慰人生?大概也就是这种状态吧。

这是一个文学个案,但可以启发我们许多的思考,思考一个作家与时代、与现实、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积累,理解一个作家的理想与情感,理解一个作家的初心与信仰。文学应该是真实的,这真实不仅是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要求主观上的真诚。通俗地说,一个作家不是真诚地相信你所说的东西?相信你笔下的故事与人物?这是衡量文学真实性的



《花灯调》,刘庆邦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标准。也缘于这个标准,读者可以通过一个时代的文学,去理解它所描绘的现实生活。当文学真诚地表达了对社会生活的情感,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歌颂还是批判,都可以见出人心、见出世风,见出一个时代在人心中的样子。所以,看到《花灯调》这样的作品,读者也会激动着庆邦的激动,欢喜着庆邦的欢喜,然后也会再次打量这个世界,回顾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火红的日子,重新回味天下脱胎的那份喜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是真诚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

用文学见证奇迹

——评刘庆邦长篇小说《花灯调》

□汪政

刘庆邦的欢欣来自于脱贫攻坚胜利这一“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也来自于他深入贵州山区所亲历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更来自于他与一位这场伟大斗争中的先进人物的近距离接触。这一人物后来被典型化为《花灯调》中的主人公向家明。按理说,从原型人物到文学人物,是一个“拔高”的过程,但是,这一人物从生活中的原型到文学中的形象,我觉得是一个去光环的过程。向家明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她就是一个普通人,夸张一点说,刘庆邦已经把她当作邻家妹妹来写了。她喜欢小猫小狗,喜欢拿着手机自拍,她害怕老鼠,动不动眼泪就流了下来。遇到不讲理的人她也会吼起来,而当身体出了问题时她也会恐惧,会悲伤。她有自己生活的小确幸、小目标,也会计较得失,盘算工资,希望升迁,会为了她以为的不公找上级,问领导……从这样的形象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刘庆邦对他笔下人物熟悉的程度。如果说他在一开始看到听到的,是原型人物的事迹介绍,那么随着深度采访,尤其是创作阶段的审美加工,他已经完全把这一人物形象还给了生活。这是刘庆邦人物塑造的当行本色,也是这个一直以现实主义写作见长的作家对笔下人物的态度,那就是从来不从概念出发,不依赖先入为主的评价。他一定要在作品中建立起人物与生活的亲密关系,不是单纯地去写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在生活中,如同把鱼放到水里,让他回归生活,从而写出他的日常,他的细

节,他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刘庆邦对脱贫攻坚的理解。也因为这一点,使得《花灯调》与传统的乡土写作有了较大的区别。小说中的高远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属于“深度贫困”点。这么一个被看成是“烂渔网”的穷村经过努力,最后通过了脱贫验收。小说刻画了如夏方东、尚应金、周志刚、秦希明、韩二哥等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写到了村民们“渴望富裕的内生动力”,他们的自主创业,特别是周志刚常年与村民们一起修路的举动,可以说是当代愚公精神的体现;但作品同时也写到了高远村的文化性格与精神拖累,比如作品中的褚大鹏、韩虎、齐天星等形象,从他们身上,读者确实能意识到高远村贫困的“主观原因”,如“习惯不好、素质不高”等等。小说的灵魂人物是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正是这位原本没有多少乡村生活与工作的女检察官,将高远村带出了贫困的泥潭。而向家明治理高远村的成功之处,是对脱贫攻坚战略的清醒认识和坚决践行,是对相关政策的正确理解与智慧运用。在区委的支持和主导下,从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教育几乎无所不包的一揽子规划,以红头文件形式下达到区属各个单位,并由内容对口单位牵头具体实施,加上高远村通力配合,高远村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提炼出一个“内外式”的结构:相对于高远村的原住群体,向家明是“外”;相对于高

远村脱胎的自身努力,上级的政策、规划及其组织实施也是“外”。在这种内外结构中,外部的人物与动作处在作品意义的核心位置,它们是作品叙事的重要推动力。

很显然,这个结构在传统的乡土小说叙事中很少见到。中国乡土文学是以漫长的农业文明为文化基因的,它的叙事路径基本上依赖于中国传统血缘关系的家族与家庭结构,而权力话语则生长于乡村自治的“小传统”。因此,中国的乡村变革是相对缓慢的,中国乡土文学也形成了内部叙事的结构传统。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轮又一轮走向深入的国家战略实施之后,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也发生了转型,自上而下的制度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当先进的理念、现代化的制度和资源优势与乡村传统文化结合之后,中国农村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花灯调》的叙事结构便是对这一变革的同构性的审美表达,这从刘庆邦几十年来农村题材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叙事变化中也可以得到验证。可以说,刘庆邦农村题材作品叙事结构的审美演变,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镜像。

所以,《花灯调》不仅是刘庆邦刻骨铭心的审美之旅,也是中国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收获。新的结构,新的人物,尤其是作家对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深刻领会与真诚响应,为新乡土文学提供了极富生长力的新质。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1 本书具备一种多线条多层次交流的特性,比如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交流,同一文体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不同文体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交流,外国文学阅读者和翻译家之间的交流,身在幕前者 and 身处幕后者(评委)之间的交流,因而形成一种交流的和声与丰富性,使人在这样的多重交流中获得种种新鲜认知,这一特点是首先要说出来的。

2 置于每篇访谈前面的“采访手记”,匠心自用,不可或缺。它们就像一个显明的路标或者言简意赅的导航手册,在大量必要功课的基础上,撮其大要,告知你接下来受访的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专长和个性。比如对于潘向黎,采访手记里是这样介绍的:“潘向黎的身上自有着一种古典美,旗袍对于她是最合适的……可她同时又是现代的,说话做事另一番生动活泼,走到哪里,哪里的氛围便热闹起来。”这简直是小说一样的描述,寥寥几笔,所描述者的形象、性情就宛若眼前。关于作家马晓丽的介绍是这样的:“马晓丽年轻时曾经在部队炊事班当过班长,每次做糊饭,她都会带着全班站在饭堂前面给大家做检讨,而现在,马晓丽是美食家,她亲手制作的各种色香味俱佳的美食常常令朋友们惊艳不已。”“马晓丽习惯于自我‘枪毙’,她的电脑里,一直雪藏着不少被自己毙掉的作品。”介绍作家周晓枫:“晓枫热爱生活,喜欢电影,喜欢旅行,喜欢美食,她的穿着总是大胆时尚,多么艳俗的大红大绿在她身上也很妥帖……她的笔触是细微的、敏锐的,她的呈现却是广阔的、厚重的;她的表现是热情的、喋喋不休的,她的内心却是羞怯的、恐惧的。”在介绍诗人路也时,作者自己先设问说:“路是谁?”接着一路慨然答来:“诗人、作家、教授,自称‘路顾客’,从小是个‘摇滚走’,连吃饭也不愿待在家里。”“长大了,她果然还是喜欢到处跑,喜欢看各种地图册……居然喜欢探访作家的故居和墓地,即便是偏僻阴森的地方她也不怵。”《堂吉珂德》的译者董燕生家里就挂着堂吉珂德的挂像,说这老先生“字典里不设‘防护墙’,想到十分非要说到十二分,有时候把话说得越尖锐刻薄,越觉得过瘾……实际上,他心地善良,又充满幻想”,等等。舒晋瑜在她的采访手记里,就是这样介绍她要采访的人物的,使人看完采访手记,就会有对受访人做更深入了解的兴趣,这无疑是舒晋瑜访谈的一个优胜之处和独到之处。

3 在访谈中,舒晋瑜也会不时引用一些其他人对采访对象的描摹概括,因为摘到了合适的位置,就使得这些引用部分以少总多,有点睛之效。比如邱华栋对徐坤的描述:“一直是短发,戴一副不断变换样式的眼镜,仔细看,她的短发讲究,总需要及时修理,打扮得利落而人时。”“她酒量大,酒品好,任何时候都是体面地坐在那里,比男子更有气魄。”

陈世旭对葛水平的描述:“一身装束满是乡村元素,像个活动的民俗博物馆。”路也的朋友对路也的描述:“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一边跑一边漏油……我想,这不就是路也吗?”迟子建描述潘向黎:“有一种清爽的妖娆。”所有这些描述,都给人一种见人见骨、一见难忘的印象。

因为引用得当,这些文字甚至显现出了比在原文中更多的光彩。曾经读过张承志写文天祥的随笔《水路越梅关》,其中引用的文天祥的诗词,就让我大感兴趣,但是专门买了文天祥的诗集来读时,感受并没有那么

强烈。把别人的诗文加以利用,从而使之焕发出别样光彩,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能力。我甚至动了心思,想把类似这样在高度概括中精准描摹人物的文字辑录到一起,形成一篇特别的文章。

4 访谈录的题目,应该也是舒晋瑜一手拟定的。这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很多题目都准确深入地写出了受访者为人文的主要特点,就好象题目是访谈的“文眼”一样,对整个访谈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不只这本书,舒晋瑜的多本访谈录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给文章起标题方面善抓七寸。比如和史铁生的访谈题目是《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这样一个题目真是再恰当不过,让人觉得辛酸的同时,又平添一种力量。

5 从前几本访谈录看,一些受访者在匆匆言说之后,业已辞别人世。年高者不说了,就连正当盛年的雷达、史铁生、李鸣生、红柯等人,也杳然西去,让人痛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同时也感到,舒晋瑜的辛苦访谈因此显露出一种特别意义。曾经来过,留言为凭,也算是虚花人生的一丝痕迹和慰藉。

6 对于几位翻译家的访谈,我好像有着特别的兴趣。印象里不少作家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一代写作者,要好好感谢各位翻译家带给我们的福惠。我们阅读的翻译文学,都是他们千里万里乘风破浪,给我们运渡过来的。说到托尔斯泰,就要感谢草婴;说到契诃夫,就要感谢汝龙;说到福克纳,就要感谢李文俊。这是应有之义。《倾谈录》中涉及到的翻译家,都很有个性,像董燕生谈及杨绛译《堂吉珂德》,说杨绛省略了一些不该省略的。当被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著 作家出版社 2024年1月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问及“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牙情况如何”时,董先生的答复也是有些过于直接了,他张口就说:“没有任何反响。”但翻译家黄燎宇对中国当代文学就没有董燕生这么悲观,虽然他也承认“我们的主流作家在德国整体而言受到冷遇”。但黄燎宇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还是很高的,尤其对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评说不以为然。这样一些观点和信息,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而且各位翻译家在翻译方面的认知都很有启发性,值得一再领会和玩味,如董燕生提到塞万提斯借《堂吉珂德》中的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翻译作品的看法,这看法是:“译文就像是编织和刺绣的反面”,这大概是翻译家们都不爱听的话,但也只有他们,对这话的理解是最深刻的吧。

7 整部《倾谈录》中,最乐于读的,倒是关于评委们的访谈。什么道理呢?也许是想看幕后的故事吧。《倾谈录》访谈到的几个评委,都特别遗憾地提到了自己中意的哪些作品最终落选。董强是第八届鲁奖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饶是副主任,他个人喜欢的《赫伯特诗集》也没能最后胜出。还有一些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丁晓原说,原本第七届鲁奖报告文学奖评委会里没有他,因为按规定,同一评委不能多次参加同一门类,但评委会主任张胜友考虑到丁晓原更熟悉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向相关领导申请后,将丁晓原增补为第七届评委。张胜友是术后带病参加评奖工作的,两个月后就去世了,这是一段让人唏嘘的往事。谢大光也是第四届鲁奖小说组评委,他说到这样一个细节:“印象最深的是,崔道怡声嘶力竭地往上推葛水平的《喊山》,他穿着红色的衬衫,极力推荐,以压倒一切的气势说:‘如果不评上,我这个评委不当了!’”类似这样一些细节,读来真是摇动人心,难以忘怀。对一个作者来说,碰到这样一位有资历、有坚持的评委,该是何等幸运。

这样一个设想:许多年后,《倾谈录》中的一些作家也许会湮没无闻,但《倾谈录》却流传了下来。会否有人指着我的名字说:“这人是个做啥的啊?”

(作者系宁夏文联专业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缘起“一闪念”,磨砺九春秋

——《章回之祖——罗贯中传》后记

□闫文盛

我准备写作《罗贯中传》,似乎出于“偶一闪念”;迄今想来,我对于这一写作所面临的难度一直准备不足。但不知不觉中,错杂、浩瀚、纵横的9年时间过去了,这部书的写作也终于到了尾声。何谓“偶一闪念”?这么说吧,我来写作这部书,似乎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因为我之前一直专注在散文、诗歌、小说领域,接触过一些与罗贯中有关的写作任务,但也仅限于地方文化中出于乡谊的成分(因为《罗贯中》——除此以外,我虽然喜读传记,稍微写一点非虚构性质的文字,但向来没有以此为重。所以,在2013年夏,因为哲夫的推荐而开始介入这项工程时,我常有恍兮惚兮之感。但这一因无知而无畏的“闪念”,从此构造了我的生活。

自2013年夏天的尾声完成写作大纲,并与作家出版社签订正式协议以来,这部书的写作迄今已然跨越了9个年头。在此期间,我从太原市文联《都市》杂志社调到了山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写作;去北京读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在接受本书写作任务的最初3年间,我将工作重心放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上:通过各种途径购藏了与《罗贯中传》写作有关的、出于古今中外各类著者之手的数百本图书;阅读、解析并顺藤摸瓜地走访了山东、河南、四川、重庆、陕西、北京、江苏、浙江、河北、福建及山西清徐、祁县等全国十个或与罗贯中生平相关、或与罗贯中研究不无牵涉的省市区县。这些工作陆续完成后,我终于在2016年5月18日开始动笔创作,到7月31日完成了近8万字,形成了本书将近半数的篇章。

但在2016年的后半,由于读研备考之事,本书的写作便暂时被搁置下来。等到研究生录取事宜尘埃落定,我在2017年3月31日再度执笔续写时,却发现由于中断形成了新的思考,全书业已完成章节也感疲而面目全非,于是在整体结构和细部方面重新梳理,用了大概一个半月进行恢复,才真正进入第二轮写作状态。这次写作从5月18日一直持续到8月26日。2017年9月去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之前,《罗贯中传》的基本文本规模达到了16万字,但仍未最后定稿。而在此前此后,我参加过两回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组织的专家会议,参加过一次中国传记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基于国内罗贯中传记写作的是一片荒漠局面,在会议中求教于各方专家,虽获益良多,但对于如何彻底完成此书的工作,却愈来愈觉得艰难,需要加倍慎重。此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首先是罗贯中生平文献的过度匮乏,但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因素,即本书文本最重要的著作《三国志演义》,是否同出于《录鬼簿续编》所记之杂剧家罗贯中之手,学界一直未有确论。在这种分歧面前,传主的面目自然无法变得清晰起来。

从2017年9月到2020年6月完成研究生学业的3年间,由于拿不出根本性的说法,而我头脑中的疑惑之处渐增,所以《罗贯中传》的终稿一直难以出笼。前述分歧带给此传写作最大的麻烦在于,传主的生平链条无法在矛盾重重的面目中首尾贯穿,且极易发生时空错位,赅述大体无法,更难以按照传记的基本要求行文。因此,在2020年秋天,当我最

后决定将此书结稿,对多年来关注和支持此传写作的众多师友,尤其对组织此书写作的中国作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的几位师长、对已经签订协议多年的作家出版社完成最后的许诺之时,我发现我面对的不是需要稍做修改的16万字,而是在时间流逝、思考不断蔓延的作用下,突显出更多自我质疑和否定的16万字。

自2020年腊月一直到2021年暮春时节最后数月的突击修改,我便是在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度过的。直到2021年4月30日,我最终提交18万字的文稿时,也没有出现如释重负的感觉。经过多年的传记写作,我原有的超强的自信心退去大半,一种从未有过的无知和无力感盘桓心头,良久不去。唯一或可感到幸运的是,由于多年

坚持,这件事在9年中我都没有觉得会确切落地生根的事,居然成功了。我确信我所执笔的这部《罗贯中传》不会是这位小说大家最后的一部传,因为此前我已隐约从各个渠道了解,愿为罗贯中作传的人并非没有,而是各位大家出于谨慎和谦虚,不愿自居人先罢了。

2021年年末,书稿审稿意见陆续返回后,结合审稿专家的意见,我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性的修改,终于到2022年年中,于炎夏带来的暑热中正式将书稿完成。但由于上文所述,今天我所能呈现的,固然也谈不上是一部扎实严谨的《罗贯中传》,它充其量,只是遵循了学界的基本研究,并以我迄今仍觉粗浅的判断力而拿出的一部粗线条的、不乏推测性结论、虽有旁征博引但距离真正的传记尚有诸多差距的作品罢了。

至于本传字里行间,关于罗贯中生平事段落不免各种漏洞,而笔者却将着眼之要点,放到了罗氏在精神层面的觉悟和灵魂之细节,在此只能祈请读者知之、谅之。因为关于传主原始的记录,实不至于支撑本传排行文,故本书在开展之际,常涉笔于元末与三国时代大势,对传主本人来说,似旁及过多,此为无奈之举,亦望读者知之、谅之。

罗贯中一生著述,以《三国演义》为其核心,因此本书提纲挈领,以一个人、一部代表性的作品,对应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此可谓笔者撰写此书之起点,也是全书最终的归结。另,对罗氏曾参与创作《水浒传》一事及其余“可能性的著作”,本传只是略为提及,并未详加叙述。其因,一出于笔者笔力未逮,二由于《水浒传》之著者,本丛书另有已传,三因《水浒传》之事,更为扑朔迷离,笔者论来论去,会显得本传更加不像一部传记,大违编者要求,也远离读者阅读趣味。

为保守传记真实之底线,本传对于晚近各地出现的罗贯中传说,令人所提之模棱两可、难证其真实的新史料,只做有限的采集。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行文尽可能删繁就简的前提下,为了厘清错综纷乱的材料之间的关系,使全书的叙述显得可信,本书在有限的记载为据,叙述罗氏生平之余,尚在必要之处采取了辩证之法,尽量节制地加入了一点作者的议论。这并非笔者要故意破坏本书的体例,实在是由于不愿姑妄言之、草率结论罢了。至于评判此书的绘制,是否尽得罗氏本相之精髓,却不属于笔者之责,只能烦读者鉴之。

《章回之祖——罗贯中传》,闫文盛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章回之祖——罗贯中传》,闫文盛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

《章回之祖——罗贯中传》,闫文盛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